

焦点对话

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大

◎主持人：邹民生、乐嘉春

生态不安全意味着大片国土失去经济承载能力

主持人：经济发展离不开安全保障。近年来，人们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关切。今天我们就来谈谈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邓聿文：好的。现在谈这个问题正当其时。因为近来出现的不少新闻，有相当部分都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

那么，什么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呢？所谓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非传统安全关注人类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它的提出是人们安全观念的改变。

从具体领域看，非传统安全可以分成几个领域：一是人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安全问题，如环境问题、能源危机、大规模疾病问题等。二是国社会内部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影响到其他国家、某个地区，甚至是整个国际社会，如经济危机、难民问题、社会危机、大规模种族清洗与人权迫害等。三是跨国性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如跨国毒品贩运、国际洗钱活动、拐卖人口、非法移民等。四是类似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社会的冲击。五是全球化及国际交流扩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国际性的电脑病毒、黑客所引发的信息安全问题等。

转型期的中国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十分复杂，而且呈现逐级放大效应，因此，必须把非传统安全威胁纳入到危机管理范畴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

王丰年：生态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1世纪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所谓生态安全，是指主体生存与发展所处的环境，不受或少受因生态失衡而致的破坏与威胁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因素主要有：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肥沃的土壤、充足的自然资源、多样而稳定的生态系统、健康无害的食品等。

在战略意义上，生态安全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防止环境问题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导致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具体而言，生态安全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国土资源安全，也就是国土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结构能满足各种需要，处于有效供给状态；水安全，也就是有充足的水资源满足各种需求；大气安全，也就是大气质量维持在可接受的水平，或者处于不造成威胁和伤害的水平；生物物种安全，也就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生态过程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以保证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以及食品安全，也就是食品中不存在危害人

■嘉宾



王丰年：清华大学副教授，生态学者，主要从事生态伦理学和人类生态学的研究。

邓聿文：法学硕士，副编审，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本报特约供稿人。

体健康的化学物质，杜绝被化肥、农药、添加剂、工业原料污染的食品。

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生态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正如中国老资格的环境学家曲格平先生所说，如果生态安全不牢固，就意味着大片国土失去对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这与国土的割让一样会给国家造成无法衡量的损失；生态环境的破坏，会造成工农业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与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并无二致。

就此而言，生态安全与国防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同等重要，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国防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是致力于创造生态安全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而生态安全则是国防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和载体。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限制

主持人：说到生态安全，不能不说我国的环境状况。那么，目前我国环境与生态状况如何？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

邓聿文：我国生态环境基础原本就比较脆弱，在人口压力和粗放型经济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目前我国生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空气、水、土地等环境要素遭破坏，自然灾害频发，资源支撑能力下降，民族生存空间收缩。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国土资源方面，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情况十分严重。据统计，目前我国土地沙化面积每年扩大300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一些地方已因为土地沙化而出现了生态难民。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0多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多。同时，危险废物污染、耕地退化、盐渍化等问题也很严重。

二是在水资源方面，河流断流、干旱和湖泊萎缩已是普遍问题，水资源短缺也日益成为严重影响城市

当时生态环境安全状态限定的极限值时，人们感受不到生态安全对经济的影响，而当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接近或超过极限值时，生态环境安全状况对经济的影响或限制就显现出来了。比如，我国因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而不得不关停小企业；由于水资源问题使得许多地方和城市发展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通过改变生态环境安全状态来提高极限值进而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这就是生态经济循环现象。

生态环境的恶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农业和贸易两个方面来看，环境危机直接带来农业危机，进而导致粮食危机。今年以来，极端异常气候很多，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威胁，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因气候变暖导致粮食大幅减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气候变化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农业生产，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小麦、水稻和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大致可能将减产37%，对中国未来20至50年后的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大国来说，粮食减产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的。

三是在大气方面，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居高不下。北方城市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的年平均浓度严重超标。世界污染严重的10座城市有5座在中国。

四是在生物物种方面，大规模外来物种入侵，已对我国本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本地生物的生存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如大米草肆虐福建沿海，已占据了闽东100平方公里的滩涂，破坏了当地红树林生存的环境，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生物资源的破坏形势令人担忧。

五是在食品安全和健康方面，情况也不容乐观。今年的食品安全事件之所以引起各方关注，表明食品安全已不是孤立的问题。另外，环境对民众健康造成的危害也引人关注。前不久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披露，中国每年因环境问题而死亡的人数高达50万人。

六是在自然灾害方面，灾害频发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例如，2006年4月发生的沙尘暴，影响范围达200多平方公里，受害人口达2亿多。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向乡村延伸，农村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很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环境灾难。

王丰年：对经济发展来讲，生态安全就是生态环境给经济发展持续提供丰富的环境资源和尽可能少的自然灾害影响。生态经济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在劳动过程中通过技术系统耦合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系统，使得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在时间、空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通过食物链、交换链、生产链相互联系、影响和制约。

由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不同生态安全状态下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极限是不同的，当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低于

律及社会文化观念的整体转变，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涉及到体制、机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就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

其次，从发展的具体手段讲，要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要求从生产的源头抓起，同时要实行资源和废物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使废弃物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把有害环境的废弃物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循环经济的一条重要原则和重要标志。

第三，根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规范国土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从源头上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除此之外，加强生态保护法制建设，充分运用法律、经济、行政和技术手段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全民生态安全意识，倡导绿色消费；以及运用市场机制促进环境保护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王丰年：在经济学上，很多人喜欢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解释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库兹涅茨曲线本来是用来说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的，因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也有类似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一些经济学家就把它移植过来，试图证明一国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会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积累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即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先污染，后改善的倒U形曲线形状。这也就是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

但是，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现实即使不说行不通，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今日的中国与工业化时期的欧美有很多不同。拿中国和美国来说，两者面积大致相当，但是，100年前的美国人口不到2亿，而目前中国的人口是13亿，人口压力大大高于美国，致使中国的人均环境容量偏小。工业化时期的美国虽然污染厉害，但中国当下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程度要比美国严重得多，而中国又丧失了美国曾经有过的将环境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的历史机遇。

另外，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远不能比的，全球化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以及发达国家实行的绿色贸易壁垒都使得发达国家将污染产业大规模地转移到中国来，加重了中国本已严重的环境污染。

所以，中国不可能再继续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道路，以牺牲环境和后代人的福利来求得当下的发展和今人的福利，就现实的严峻来看，注定是行不通的。

必须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摒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通过大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性调整，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污染问题。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舍此别无出路。

■看点

● 所谓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非传统安全关注人类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它的提出是人们安全观念的改变。生态安全是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1世纪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 构成生态安全的因素主要有：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肥沃的土壤、充足的自然资源、多样而稳定的生态系统、健康无害的食品等。生态安全与国防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同等重要，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 目前我国生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资源支撑能力下降，民族生存空间收缩。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国土资源方面，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情况十分严重。二是在水资源方面，河流断流、干旱和湖泊萎缩已是普遍问题，水资源短缺也日益成为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重要问题。三是在大气方面，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居高不下。四是在生物物种方面，大规模外来物种入侵，已对我国本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本地生物的生存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五是在食品安全和健康方面，情况也不容乐观。今年的食品安全事件之所以引起各方关注，表明食品安全已不是孤立的问题。六是在自然灾害方面，灾害频发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

● 要治理环境危机，维护生态安全，首先要转变发展方式，坚持环境与发展“双赢”，建立经济与环境融合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从发展的具体手段讲，要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第三，根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规范国土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从源头上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编余

一个概念——“非传统安全”概念，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那么，什么是非传统安全，它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哪些影响？这是我们与本次对话嘉宾所要探讨的话题。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不得了。原来非传统安全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生态安全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基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据嘉宾介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十分复杂，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生态安全方面，形势也并不乐观。有专家甚至说，如果生态安全不牢固，就意味着大片国土失去对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这与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并无二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那么，如何化解环境危机、维护生态安全？嘉宾认为，首先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树立经济与环境融合观，从传统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从物质生产方式到政治、法律及社会文化观念的整体转变，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等一系列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

看来，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面临的任务并不轻松。在此过程中，资本市场又能发挥哪些作用、面临怎样的机会呢？恐怕各大机构的市场策略师们又有新功课要做，而投资者自然也会密切关注“非传统安全”因素对投资市场的影响，并由此发掘出可观的投资机会来。

——亚夫

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邓聿文

价值的经济。

在传统经济学看来，生态环境作为劳动对象或生产条件，是经济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假定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企业与环境之间是一场零和博弈，存在着顾此失彼的权衡关系：一方是社会效益，它得益于环保标准的设立；另一方是企业实行污染防治与清洁生产的成本，它会导致产品价格的上升和企业竞争力的削弱。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就是建立在这一经济学基础上的。绿色经济学则把经济系统看作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生态系统物质与能量循环的原理而进行。因而，实现企业与环境的共赢是经济界和企业界的共识，环境不再是企业的负担，而成为一种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资源。

绿色经济的范围很广，包括生态

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环保产业、绿色服务业等。发展绿色经济，首先是重在树立全球性绿色意识，开发利用绿色清洁能源，生产绿色产品，推广绿色生产技术，大办绿色企业，建立绿色市场，促进绿色营销，发展绿色贸易，制定绿色政策，开征绿色税，创建一个和谐高效的绿色经济环境和一个生态安全的绿色社会。其中，关键的有三个方面：一是树立绿色意识，包括绿色生产意识和绿色需求意识。二是应用绿色技术，生产绿色产品。绿色技术亦即清洁生产技术，它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其一指生产技术系统的运转对生态系统的消极影响很小或有利于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其二指产品技术功能的发挥以及报废后的自然降解过程对生态系统的消极影响甚微；其三是指单元技术在产业技术系统中的应用可明显减轻和部分消除原技术系统的生态负效应。

是建立绿色市场，发展绿色贸易，强化绿色标志管理。

目前我国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关键时刻，我们离发达国家和工业社会还很远，从这一角度看，绿色经济的时代尚未到来，但是，由于全球化，全球生态危机加速了世界向后现代转化的步伐，我们作为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不能不注意绿色经济。特别是中国本身资源消耗非常大，环境堪忧，因此，我们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不能照搬目前在西方已盛行的绿色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但他们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的。

现阶段，我国发展绿色经济要跨过的第一道门槛，是规模化。规模化是企业推行绿色经济的基础，企业只有一定规模，才能从资源的循环利用中获得效益。而跨过这个门槛，企业常常需要政府赋予它“第一推力”。

政府应该制定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引导和促进企业及消费者实施这项战略。

就此而言，在绿色经济发展中，政府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包括制定总体战略方针和政策，拟订绿色资源发展计划和开发方案等。当然，绿色经济说到底也是一种经济模式，因此必须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运行。如果忽略了市场机制，过分依赖政府点对点的资金、政策支持，绿色经济的可行性也会出问题。

总之，绿色经济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把“钥匙”。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它既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又能保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与恢复；既能够使人类得到温饱安全保障，又能使人类环境得到生态安全保障，使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不过，发展绿色经济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极大挑战，要真正使绿色经济成为一种主流的经济形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